

“我本楚狂人”

—論李白的荊楚文化情結—

梁 惠敏·孟 修祥

公元725年，也就是唐玄宗開元十三年，當高山和高原所環抱的“天府之國”限制了一位天才詩人的文化視野，不足以滿足其文化興趣的時候，就註定了他必然要走出封閉的四川盆地，為著自己的理想追求，嚮往更為廣闊的世界^①，這位詩人就是李白。

一、荊楚詩情與詩思

25歲的青年李白“仗劍去國，辭親遠遊”，滿懷“使寰區大定，海縣清一”的美好理想與憧憬進入“江入大荒流”的壯闊楚境時，眼界頓時為之豁然開朗。進入荊楚之地的開始，就似乎決定了他一生與楚地不可開解的文化情結。

李白一生漫遊過大半個中國，他的足跡更是遍及三楚^②故地，用他《與韓荊州書》中的話說：“白，隴西布衣，流落楚漢”，以他《暮春江夏送張祖監丞之東都序》之語而言：“凡江、漢、荊、襄、吳、楚……亦何所不登眺”，據李白自己說，荊楚這塊神奇的土地對他充滿無窮誘惑的原因，來自於他的異代同鄉司馬相如《子虛賦》對楚雲夢澤的生動描繪，其《上安州裴長史書》說：“鄉人相如大誇雲夢之事，云楚有七澤，遂來觀焉。”無論其來荊楚的真實動機如何，當他親身感受到楚地神奇無比的江山勝景與風土人情時，確實受到了深深地感動，或者說，他的荊楚文化情結早在出蜀之前就已在孕育之中，至荊楚之境，此情結越發不可開解。他幾次親臨洞庭、瀟湘，追憶憑弔遠古時代的娥皇、女英與大舜的故事與傳說，如《陪族叔刑部侍郎曄及中書賈舍人至遊洞庭湖五首》其五：“洞庭西望楚江分，水盡天南不見雲。日落長沙秋色遠，不知何處吊湘君”，《悲清秋賦》：“登九嶷兮望清川，見三湘之清”，甚至在《在與夏十二登岳陽樓》中描繪其壯麗景色：“樓觀岳陽盡，川迴洞庭開。雁引愁心去，山銜好月來”，以至於即景生情，激動得開懷暢飲，起舞高歌。他留下的許多寫洞庭湖壯麗景色的詩作如《遊洞庭》：“南湖秋水夜無煙，耐可乘流直上天？且就洞庭賒月色，將船買酒白雲邊”，《寄王明府》：“嘯起白雲飛七澤，歌吟淥水動三湘。莫惜連船沽美酒，千金一擲買春芳”等等，恐怕與司馬相如《子虛賦》對雲夢澤的描繪有關。他也曾因荊州賊亂^③，感懷過曾作為楚國故都的郢都與章華台的荒蕪與殘破：“郢路方丘墟，章華已傾倒”（《荊州賊亂臨洞庭湖言懷作》）；游應城湯池，不僅讚歎其“氣浮蘭芳滿，色漲桃花然”的陰陽造化的神奇，同時感慨其“散入楚王國，分澆宋玉田”（《安州應城玉女湯作》），造福荊楚大地的功績；他到襄陽，既有因好朋友孟浩然

是襄陽人而產生特別的親切感，同時也聯想到曾鎮守過襄陽而以豪飲著稱的西晉名將山簡，更遙想到戰國時代楚襄王巫山雲雨的故事與長江岸邊的淒涼猿聲，《襄陽歌》所謂“襄王雲雨今安在？江水東流猿夜聲”即是；他在《赤壁歌送別》中繪聲繪色地描寫發生在荊楚大地的赤壁古戰場：“二龍爭戰決雌雄，赤壁樓船掃地空。烈火張天照雲海，周瑜于此破曹公……”，追憶驚心動魄的三國赤壁之戰，以至於使李白“我欲因之壯心魄”，心情為之振奮不已。他心情好的時候，峨峨楚山，浩浩江漢，令他浮想聯翩，感慨萬端；被貶後心緒煩亂之時，則是“回巒引群峰，橫蹙楚山斷”（《流夜郎至西塞驛寄裴隱》），但李白畢竟是一位達觀詩人，即使是在流放夜郎途中，也在江陵城郊慨然登上龍山，情不自禁地留下《九日龍山飲》之類的曠達詩：“九日龍山飲，黃花笑逐臣。醉看風落帽，舞愛月留人”，因桓溫和孟嘉在龍山留下的一段佳話，激發起詩人盎然詩興，第二天仍興猶未盡，再游龍山，題《九月十日即事》之詩：“昨日登高罷，今朝更舉觴。菊花何太苦，遭此兩重陽。”據宗懷《荊楚歲時記》說，荊楚之地有視九月十日為“小重陽”的習俗：“都城士庶，多於重九後一日再集宴賞，號小重陽。”李白所謂“遭此兩重陽”即言此習俗。

李白有為數甚多的詩文都與荊楚江山勝景、歷史人物、事件、傳說、風土人情等等無形地聯繫在一起。荊楚江山勝景可以激發出李白的無限詩情，劉勰《文心雕龍·物色》曾云：“屈平所以能洞監《風》《騷》之情者，抑亦江山之助乎？”李白與屈原在創作上有其非常一致之處，其許多詩文名世亦得南方“江山之助”。荊楚歷史人物、事件、傳說是一個豐富的歷史文化世界，江陵為楚國建都411年的都城，又與襄陽在後來的漢魏六朝直至唐代均為南方重鎮，荊楚僅此兩地在歷史上產生的著名歷史人物與重大事件以及各種傳說故事等等，在詩人的無限詩思之中，“攪碎古今巨細，入其興會”⁶⁴，從而成為詩人情思與情感的符號，現實生活的投影。它帶著理性的激情，歷史的現實感，顯現出詩人獨具特色的心靈世界。

至於荊楚之地的風土人情、各種歌舞均成為李白激發詩思的媒介。李白精於音樂與舞蹈，寫下了很多描寫吟詠音樂與舞蹈的作品，如《白紵詞》、《秋登巴陵望洞庭》、《聽蜀僧浚彈琴》、《月夜聽盧子順彈琴》、《擬古》其二、《春日行》、《鳳笙篇》等等就是描寫吟詠音樂之作，在眾多的中國古代音樂系列中，李白認為楚樂最為中聽，楚舞更令人陶醉，他在《天長節使鄂州刺史韋化德政碑並序》中明確表示：“白觀樂入楚，聞韶在齊”，《書情贈蔡舍人雄》所謂：“楚舞醉碧雲，吳歌斷清猿”，高度讚賞楚樂楚舞的藝術魅力。以楚樂為例，如《陽春》、《白雪》、《激楚》、《結風》之類，特別受到李白的青睞。《陽春》、《白雪》為眾所知，李白在詩文中多次藉以抒情寫意，如《古風》其二十一“郢客吟《白雪》，遺響飛青天”即是；《激楚》、《結風》亦為楚地歌舞曲名，其音調高亢淒清，最早記載于《楚辭·招魂》：“宮廷震驚，發激楚些”，王逸注：“激，清聲也。言吹竽擊鼓，眾樂並會，宮廷之內，莫不震動驚駭，複作激楚之清聲，以發其音也。”司馬相如《上林賦》亦云：“鄢郢繽紛，《激楚》《結風》。”顏師古注：“郭璞曰：《激楚》，歌曲也。”《史記索隱》曰：“《激楚》，急風也。《結風》，回風，亦急風也。楚地風既漂疾，然歌樂者猶複依激結之急風以為節，其樂促迅哀切也。”這種“促迅哀切”之楚樂非常符合李白的審美趣味。他的《白紵辭》之三有明確表白：“《激楚》《結

風》醉忘歸，高堂月落燭已微。”正是受楚樂的影響，其中也包括楚地民歌，使他情不自禁地創作出如《荊州歌》⁵⁵、《襄陽歌》、《襄陽曲》、《大堤曲》、《陽春歌》等，以荊楚古歌名以詠荊楚之事，或感詠世情，或感慨人生，皆別有韻味。

何以使李白留連忘返于荊楚之地？明代宗臣曾有《過採石懷李白十首》，其九首可視為對此問題的回答：“短筇踏破楚山青，日日蒼梧醉洞庭。何事淹留姑蘇水，千秋風雨怨湘靈。”以青青楚山、浩浩洞庭與湘靈的傳說故事為代表，就是使李白留連忘返于荊楚的重要原因，因此，此詩亦極能說明李白與荊楚文化的情緣。

李白於詩歌創作有其“天機俊發”的思維方式。《秋夜于安府送孟贊府兄還都序》說：“……（白）雖長不過七尺，而心雄萬夫，至於酒情中酣，天機俊發，則笑談滿席，風雲動天。”這是一種敏妙通靈的思維藝術特點。它需要飽滿的情緒，酣暢自足的創作狀態，李白往往在酒酣耳熱之際，乘興而起，發想無端，轉折無痕，正如陸機《文賦》所謂：“若夫感應之會，通塞之際，來不可遏，去不可止。方天機俊發，夫何紛而不理。思風發於胸臆，言泉流與唇齒。紛葳蕤以馭選，唯豪素之所擬，文徽征以溢目，音泠泠以盈耳。”李白《江上吟》所謂“興酣筆落搖五嶽，詩成笑傲凌滄洲”是也。在荊楚文化史上的一些事典，對於李白來說，常常是借題發揮或抒寫情志的中介。如《古風》其二十一：“郢客吟《白雪》，遺響飛青天。徒勞歌此曲，舉世誰為傳？試為《巴人》唱，和者乃數千。吞聲何足道？歎息空淒然。”⁵⁶這顯然是以宋玉《對楚王問》的故事來借題發揮。所以蕭士贊指出：“此篇感歎之詩也。高才者知遇之難，卑污者投合之易，古猶今也。士負才而不遇，能不讀其詩而為之吞聲歎息也與？”流放夜郎途中於巫山所作《古風》其五十八“神女去已久，襄王安在哉？荒淫竟淪沒，樵牧徒悲哀”，也是以寫人生之空幻感。他要表達達觀的人生態度，就借用莊子“物化”的故事：“莊周夢蝴蝶，蝴蝶為莊周。一體更變易，萬事良悠悠。乃知蓬萊水，復作清淺流。青門種瓜人，舊日東陵侯。富貴故如此，營營何所求？”（《古風》其九）在《古風》其三十五中一連用了《莊子》一書中的“東施效顰”、“邯鄲學步”、“運斤成風”三個成語，以批判詩壇的雕琢之風習，而宣導純樸自然的詩風。《古風》其三十六“抱玉入楚國，見疑古所聞。良寶終見棄，徒勞三獻君”，就是用卞和三獻寶玉于楚王的故事。即便是發感歎時局之詩也用楚國歷史故事，如《酬裴侍禦對雨感時見贈》：“楚邦有壯士，鄢郢翻掃蕩。申包哭秦庭，泣血安將仰？鞭屍辱已及，堂上羅宿莽。頗似今之人，蝨賊陷忠讜。”借用楚平王時伍子胥與申包胥的故事，來指斥安史之亂所造成的現實境況等等，諸如此類，皆源於李白“天機俊發”的思維方式。荊楚之地神奇的江山勝景與博大精深的文化內涵不僅吸引了偉大詩人李白，形成了他不可開解的文化情結，同時激發出詩人生命的活力與創作的張力。李白以“楚狂”自詡，“酒隱安陸，磋砣十年”，在楚地生兒育女，這是他與普通人沒有差別的對生命的創造，但他在楚地所創作的許多千古名篇，所流傳的千秋佳話，卻是他對文化精神卓越的審美創造。李白詩文既顯現出他一生的心路歷程，也記載著他與荊楚文化的不解之緣，在很大程度上，李白身上流淌著濃厚的荊楚文化的精神血液，積澱著荊楚文化的藝術靈氣。

二、並莊、屈以為心

在眾多的荊楚歷史人物中，最具有楚文化精神的代表人物無疑是屈原，而最能引起李白精神共鳴的人也就是屈原。

自視甚高的李白以為自己“天為容，道為貌，不屈己，不幹人，巢、由以來，一人而已”，一心想作帝王師，一如屈原自以為有“內美”、“修能”，即可為楚王建立“美政”理想而“導夫先路”。於是，李白對自己的人生道路進行過於理想化的設計：

申管晏之談，謀帝王之術，奮其智能，願為輔弼。使寰區大定，海縣清一，事君之道成榮親之義畢。然後與陶朱、留侯，浮五湖，戲滄洲，不足為難矣。（《代孟少府移文書》）

開、天盛世也確實為李白敞開了理想的大門，對此，李陽冰《草堂集序》如此描述：“天寶中，皇祖下詔，征就金馬，降輦步迎，如見綺、皓。以七寶床賜食，御手調羹以飯之。曰：‘卿是布衣，名為朕知，非素蓄道義，何以及此？’置入金鑾殿，出入翰林中。問以國政，潛草詔誥，人無知者。”范傳正《唐左拾遺翰林學士李公新墓碑並序》亦云：“論當世務，草答蕃書，辯如懸河，筆不停輟。……遂直翰林，專掌密命，將處司言之任，多陪侍從游之。”當時的李白已是成功地邁開了政治理想之途的第一步。然而，李白既有“斗酒詩百篇”的才氣，更有杜甫《飲中八仙歌》所說的“天子呼來不上船，自稱臣是酒中仙”的傲氣，李白也自言：“揄揚九重萬乘主，謔浪赤墀青瑣賢。”（《玉壺吟》）狂傲之氣溢於言表，亦可見杜甫之言不虛。蘇東坡說李白“戲萬乘若僚友，視儔列如草芥”，本是對天才詩人品格個性極高的定位，但對一位自比管、葛的人來說，這種行為在政治上未嘗不是一種極其幼稚之舉。到底是自己的族叔李陽冰能為之正名，李陽冰《草堂集序》說：“醜正同列，害能成謗，格言不入，帝用疏之。”真正的詩人總是張揚個性，循行自然，對任何人都不設防，這正是詩人在政治漩渦中極易受到傷害的原因。李白在長安沒待上兩年，即被“賜金放還”，晚年誤入永王李璘軍幕又遭到第二次放逐——長流夜郎。正是這種政治之途的不幸遭際，使他情不自禁地想到歷史上一位偉大的楚人：屈原。他大聲疾呼：“悲來乎！悲來乎！……漢帝不憶李將軍，楚王卻放屈大夫”（《悲歌行》）！他將屈原的悲怨視為自我的不幸：“昔者屈原既放，遷於湘流，心死楚地，魂飛長楸。聽江風之嫋嫋，聞嶺猿之啾啾。永埋于淥水，怨懷王之不收。”（《擬恨賦》）《楚辭·漁父》說：“屈原既放，游于江潭，行吟澤畔，面目憔悴。”李白被流放夜郎是“遠別淚空盡，長愁心已摧。三年吟澤畔，憔悴幾時回。”（《贈別柳判官》）杜甫在秦州聽說李白被流放夜郎，十分悲憤，曾在《天未懷李白》一詩中將李白與屈原並比：“文章憎命達，魑魅喜人過。應共冤魂語，投詩贈汨羅。”仇兆鼐注雲：“冤魂指屈原，投詩謂李白。”又說：“（李白）夜郎一竄，幾與汨羅同冤。”李白同屈原一樣，在政治上遭受殘酷打擊時，借助於詩歌將自我的一腔怨憤傾吐出來，實現了在現實中無能為力到發憤創作的生命張力的轉化，把生命的苦難化作抒寫的動力，又達到了以詩歌批判現實、干預現實，

從而實現詩人審美價值的目的。他的許多作品如《將進酒》、《行路難》、《玉壺吟》、《江上吟》、《悲歌行》等，就是詩人在與現實發生衝突，遭受不幸，把壓抑在內心的悲憤、憂慮與怨憤轉化為衝擊千古的創作激情一瀉而出的名作，因而具有震撼人心的藝術力量。明人黃文煥《楚辭聽直》說“唐李白得騷之精”，也正好應證了李白“哀怨起騷人”的論斷。

李白之所以高度評價“屈平詞賦懸日月”（《江上吟》），並且在創作上“驅馳屈、宋”（李陽冰《草堂集序》），以至於後人如屈大均《採石題太白祠》認為李白“樂府篇篇是《楚辭》”、劉師培《南北文學不同論》認為“（李白）樂府則出於《楚辭》”。李白詩歌源于楚辭的審美認同，實則源於其對屈原文化精神的心理認同，美國學者勞倫斯·A·施耐德曾說：“每個時代的中國知識份子都有著一個自己所需要、所解釋的屈原”，當他們試圖建立與政治權力、價值觀念及文學藝術的觀念系統時，他們都從屈原的人格精神中找到答案⁷⁰。“屈宋已逝，無與堪言！”（《夏日諸從弟登海州龍興閣序》），李白在內心深處對屈原的人格精神充滿無限敬意，對屈原的不幸充滿感傷，感同身受，從而引發強烈共鳴，將屈原的情志融入詩文創作之中自然是順理成章之事。

人們常說先秦時代的老、莊道家哲學是南楚文化精神的代表，孔、孟儒家哲學是中原文化精神的代表。如張正明先生在世時曾以問答形式說，如果有人問楚國的精神文化為何，“答案只有三個字——巫、道、騷。依我看，這三樣也是甲天下的。”⁷¹道，即以老、莊為代表的道家。李白對儒道兩家取捨分明：“我本楚狂人，鳳歌笑孔丘⁷²”（《廬山謠》），以“楚狂”自詡，而嘲笑孔丘，雖然對詩人即興而抒發的感情並不能作為政治宣言來看⁷³，但從李白的骨子裏對古代的孔丘，還有與李白同時代的“魯儒”是頗不以為然的，《嘲魯儒》說：“魯叟談五經，白髮死章句。問以經濟策，茫如墜煙霧。”《送魯郡劉長史遷弘農長史》也說得非常明確：“仲尼且不敬，況用尋常人？”他心儀的確是老、莊這兩位南楚哲學家。他自幼遍覽諸子百家，熟讀老、莊著作，老子與莊子的批判意識、懷疑思想、自由精神與曠達哲學無疑對李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老、莊身處奴隸社會向封建社會轉變的春秋戰國時代，在劇烈的社會動盪中，極力宣揚道家思想，對維護奴隸主與封建主的儒家禮義進行了尖銳的批判，《老子》第三十八章說：“故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顯然老子視儒家所謂“仁義”與“禮”為社會禍亂之首。莊子更是對儒家標榜的“仁義”採取猛烈批判的態度，《莊子·胠篋》說：“為之仁義以矯之，則並與仁義而竊之。何以知其然邪？彼竊鉤者誅，竊國者為諸侯，諸侯之門仁義存焉。”老、莊的這種批判意識與懷疑思想無疑是對李白有著深刻的啟迪意義的。

李白待詔翰林時，有過一年多的宮廷生活，這使他對最高統治集團的腐朽生活與鉤心鬥角、相互傾軋的內幕有比較清楚的觀察與清醒的認識，他的許多作品將批判的鋒芒直指最高統治者，如《古風五十九首》中一些作品批判唐玄宗晚年迷信求仙追求長生不老之藥、窮兵黷武發動“西屠石堡”、攻打南詔系列戰爭等等，《答王十二寒夜獨酌有懷》批判朝廷中一批王公貴族、奸佞小人恃寵驕橫、嫉賢妒能，痛罵他們是“寒驢”、“蒼蠅”、“雞狗”，並且表示憤怒之情：“何不令皋繇擁芻橫八極，直上青天掃浮雲！”（《魯郡堯祠送竇明府還西京》）諸如此類之作甚多，均表現出強烈的批判意識。

李白批判現實是與其鄙棄權貴，蔑視功名富貴的曠達情志是聯繫在一起的，他的《憶舊遊寄譙郡元參軍》“黃金白璧買歌笑，一醉累月輕王侯”，《將進酒》“鍾鼓饌玉不足貴，但願長醉不願醒”，《答王十二寒夜獨酌有懷》“榮辱與我何有哉”，“達亦不足貴，窮亦不足悲”，《江上吟》“富貴功名若永在，漢水亦應西北流”，《夢遊天姥吟留別》“安能摧眉折腰事權貴”等等就是這種曠達情志的直露表達。這種鄙棄權貴，蔑視功名富貴的曠達情志因緣老、莊，《老子》講“不得難得之貨”，“生而不恃，為而不有”，《史記·老子韓非列傳》說，莊子“寧遊戲汗濱之中自快，無為有國者所羈”，斷然拒絕楚威王厚幣之迎，為相之許，李白說：“嚴陵不從萬乘遊，歸臣空山釣碧流。自是客星辭帝座，元非太白醉揚州。”（《酬崔侍禦》）以嚴子陵自喻不臣于天子的兀傲形象與莊子拒絕楚威王之請的高傲形象何其相似！

曠達源於對社會的洞鑒，亦源於對生命的深刻體悟，無論是李白“吾將囊括大塊，浩然與溟滓同科”（《日出入行》）這種循行自然，與自然為一的超然情懷，還是“桃花流水杳然去，別有天地非人間”（《山中問答》）“三杯通大道，一鬥合自然”（《月下獨酌》）之類人天圓融的生命境界與審美感受，都可以從莊子那裏找到哲學的依據。《莊子·齊物論》說：“天地與我並生，而萬物與我為一。”“眾人役役，聖人愚芘，參萬歲而一成純。萬物盡然，而以是相蘊。”李白與莊子在對待人生、生命的態度上真可謂異代知音。當然，老、莊哲學中看透生命本質的一面同時也影響了李白產生人生如夢，及時行樂的思想觀念。如《老子》第二十三章說：“飄風不終朝，暴雨不終日，孰為此者，天地。天地尚不能久，而況人乎？”《莊子·知北遊》說：“人生天地之間，若白駒過隙，忽然而已。”所以李白有了“處世若大夢，胡為勞其生？所以終日醉，頹然臥前樽”（《春日醉起言志》）以及“人生得意須盡歡，莫使金樽空對月”（《將進酒》）這種追求心靈解脫的處世哲學觀念。

龔自珍在《定庵文集補編·最錄李白集》中說：“莊、屈實二，不可以並，並之以為心，自白始。”儘管由於時代與詩人身份之不同，使李白缺少莊子的思辨力量，也缺少屈原的深沉情感與寧為玉碎不為瓦全的不屈意志，以及對社會、人生、自然追問到底的精神，但確實融匯了他們兩人的批判意識、懷疑精神、哲學思想與詩性智慧。並莊、屈以為心既可視為李白在當時的精神創造，也可視為李白一生的精神皈依。

注：

(1)、日本學者松浦友久先生認為李白出蜀之後，“缺乏與巴蜀的實際關係”，與他的客寓意識有關，“李白沒有像杜甫那樣的故鄉。直接言及巴蜀為故鄉的，只限於他出遊後十年以內的詩，晚年敘述對巴蜀的憶念，也是因為文學上關合蜀帝傳說而歌詠三巴，或因友人去羅浮山（仙山）而言及蜀中仙山峨嵋山，都是隨機而作之詩。雖然也巧妙地寫出了他的鄉愁，但卻不是那種內在湧發沉浸執著於其中而不能自拔的鄉愁。”，參見松浦友久《李白的客寓意識信其詩思——李白評傳》中譯本，第82—84頁，中華書局，2001年。

(2)《史記·項羽本紀集解》引孟康語曰：“舊名江陵為南楚，吳為東楚，彭城為西楚。”（《史記·項羽本紀》）《史記·貨殖列傳》也明確說，淮河以北的沛、陳、汝南、南郡為西楚，彭城以東的東海、吳、廣陵為東楚，衡山、九江、江南、豫章、長沙為南楚。從戰國末期的政治格局來看，江陵、吳、彭城乃是楚人的核心地帶。楚國在戰國中後期由於政治腐敗，受秦攻擊，屢次遷都，使其政治文化中心亦多變動。公元前278年（楚頃襄王二十一年）秦將白起拔郢，頃襄王被迫東遷至陳（今河南淮陽）為陳郢。公元前253年（楚考烈王十年），為避秦、韓、魏兵鋒，又遷都于巨陽（今安徽太和東南）。公元前241年（楚考烈王二十一年），再遷都壽春（今安徽壽縣）。幾次遷都選擇在淮河流域，那麼，不僅江淮地區，就是黃淮地區的南部，也與荊楚文化有著重要的關聯。所以，“三楚”之地，以江陵、吳、彭城為核心，包括兩湖地區以及河南、山東南部地區，江蘇、安徽、浙江、江西、陝西、四川等部分地域，在自戰國中至漢初，江淮流域則為荊楚文化核心區域，當時亦稱“三楚”，近、現代從上述地區所出土的楚文物更能說明問題。

(3)、據《通鑑·唐紀》載：“幹元二年八月，襄州將康楚元、張嘉延據州作亂，楚元自稱南楚霸王。九月，張延嘉襲破荊州，有眾萬餘人。澧、朗、郢、峽、歸等州官吏，爭潛竄山谷。十一月，商州刺史韋倫發兵討之，生擒楚元，其眾遂潰。”

(4)、王夫之《明詩選卷二》。

(5)、一名《荊州樂》，又名《江陵樂》，《樂府詩集》中屬“雜曲歌辭”，其古辭云：“紀南城裏望朝雲，雉飛麥熟妾思君。”

(6)、安旗主編《李太白集編年注釋》上冊，第569頁，巴蜀書社，1990年。

(7)、勞倫斯·A·施耐德《楚國狂人屈原與中國政治神話》，中譯本，第38頁，湖北教育出版社，1990年。

(8)、張正明《巫道騷與藝術》，載《楚文藝論集》，湖北美術出版社，1991年。

(9)、自古以來，大多數人認為楚狂接輿是一位隱士，只有極少數人認為他是一位不與統治者合作的賢者，甚至認為是屈原之“嚆矢”。如清代彭松毓的《楚狂接輿論》說：“魯論以楚狂接輿類記於沮、溺之次，說者遂以隱士當之，而不知非也。沮、溺、丈人皆托業於畎畝，而不復容心於當世，此晨門、荷蕢無以異，夫子之所謂果哉者也。若接輿則大不然，何以知其不然也？於其所歌知之。使接輿而果隱者也，則泥塗軒冕，鄙棄門笏，豈猶知今之從政者？其致慨於今，必不能忘情於昔……然則接輿蓋楚之賢者也。傷鳳德之衰，有生不逢時之慨，憫孔子亦自憫也。後有屈原以忠放行，行吟澤畔，作《離騷》之詞，接輿蓋為之嚆矢已。……”，湖北地方古籍文獻叢書《湖北文征》第十卷，第125—126頁，湖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

(10)、李白對孔子也並非全然否定，《武昌宰韓君去思頌碑並序》云：“仲尼，大聖也，宰中都而四方取則。”《書懷贈南陵常贊府》雲：“君看我才能，何如魯仲尼。”《送方士趙叟之東平》云：“西過獲麟台，為我吊孔丘。念別複懷古，潸然淚空流。”皆可見李對孔子的評價視具體環境與心情而定。參見拙著《謫仙詩魂》第108頁，湖北人民出版社，1996年。

2011年2月4日於古城荊州

(梁 惠敏：長江大學藝術學院副教授)

(孟 修祥：長江大學荊楚文化研究中心教授)